动态·书评

“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综述

牛贯杰　阚红柳

2000年4月27日，由中国史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共同举办的“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从事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70余人出席了会议。大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主持。大会对戴逸主编的9卷本《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指出，拿一个世纪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目前在中国史学界还是空前的。从宏观上讲，把中国放到世界范围内进行局部和整体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十八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康雍乾盛世的阶段；而在世界范围内，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发展，中国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从微观上讲，进行扎实详尽的比较研究，相同的地方可以看出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出各自发展的不同特点。进行这样的研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研究内容本身，而且对于史学方法论的突破更新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逸作了题为“十八世纪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的地位”的主题发言。他指出，从历史上看，十八世纪是伟大的世纪，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在这个世纪，发生了英国的产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革命、启蒙运动等，震撼了世界，改变了世界。这个世纪有两大趋势：一是生产力加速发展。十八世纪以前，人类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而这个时候，人类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打开地球宝贵资源的钥匙，生产力喷涌而出，物质资源滚滚而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二是世界各地联系的加强。古代由于地理距离相对遥远，海洋的阻隔，交通工具的落后，人们生活在各自的角落里。十八世纪人类从“老死不相往来”的格局中走出来，打破了自给自足的格局，实现了联系的畅通，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戴逸接着从综合国力的角度阐述了十八世纪中国的状况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纵向上讲，十八世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繁荣兴盛的时代。而横向上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中国也是大国。他从人口、工农业生产、城市和军事力量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同时他还指出，尽管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言之有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占有量的缺乏；经济发展机制上存在着严重缺陷；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

与会代表对“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18世纪中国与世界”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马大正指出，《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是目前研究十八世纪中国的纲领性论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瞿林东认为，《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开辟了一种史学研究的规模，从更广泛

[收稿日期] 2000—04—30
[作者简介] 牛贯杰，(1974－)，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阚红柳（1973－），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的视野把中国放到世界中去看。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关心一些具体问题，而缺少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本书的编写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值得史学界参考和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的张椿年认为，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值得研究，因为大国的兴衰是世界性的研究问题，所以最早被列为国际史学会研究的课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徐蓝认为，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同时从世界的角度看待中国，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整个社会的变迁。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历史观念进入中国已经近二十年了，但却从未有人真正地用这种方法研究问题，而戴逸主编的这套书做到了这一点。搞世界史的没做到，而搞中国史的却做到了。清华大学历史系王宪明认为，十八世纪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长期以来欧美史学家占主导地位，而戴逸主编的书是中国史学界第一次集团作战研究十八世纪的历史。百余年来西方在对十八世纪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非常有名的定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者的思路。而戴逸主编的书各卷侧重点不同，但系统完整，涉及各个层面，打破了一些西方定论，使问题得到了更好的解释。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张明富认为，把十八世纪的中国和世界进行比较，能更好地体现中国的特色，在教学和科研上都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二）十八世纪的世界。清华大学历史系刘桂生认为，十八世纪是一个转折点，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十八世纪产生的，而结构性社会的出现是历史性的转变。关于十八世纪世界史研究的新动向成为大会讨论的一个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耿昇指出，以往西方史学界对于十八世纪的历史贡献评价很高，但最近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徐浩指出，西方史学界就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西方从十五、十六世纪直到产业革命是缓慢的发展进程，如勒高夫认为西方封建社会一直延长到十八世纪。因此在时间上东西方资本主义起源（萌芽）是平行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李世安则认为研究一个时代，必须抓住其特点。十七世纪是理性时代，而十八世纪则是启蒙时代，发生了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关注世界史学界的新动向，了解和掌握其新观点，对于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研究的深化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三）十八世纪的中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王思治认为，十八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表现在三个方面：国家大一统的最终完成；经济的高度发展；传统文化的总结。从世界范围来看，近代国家意识初步觉醒。十八世纪“君”“国”观念开始疏离。统治者逐渐确立了国家领土的观念，已经有了明确的行政区划、管理和税收以及管辖制度，这些都是公认的国家主权要素。同时他还指出，十八世纪以前，中国的防御重心在北方；而十八世纪以后，防御重心南移，这种态势的变化值得进一步地研究和探讨。马大正认为，首先应该肯定十八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在此基础上应该关注盛世光环下的阴影。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思考：这个阴影有没有，有多大？产生阴影的原因是什么？阴影的严重后果是什么？以往对统治者的无能等内因研究不够，似乎只强调外国对中国的侵略。此外他还针对统治者的政策提出了反思，如边疆政策、治边思想，等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明翰对十八世纪中国在世界上仍处领先地位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当时是个封建大国，但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之后，已经相对落后了。这种状况似乎用“重疾”来概括更为恰当。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成崇德认为，十八世纪中国的边疆开发是被动的开发。由于人口压力，流民进入西部进行开发，而官方却采取了封禁政策。传统观点认为清政府的政策是错误的，而从现代意义上讲，退耕还牧，禁止采矿等措施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他提出对清政府的封禁政策应予重新评价。中山大学历史系陈春声作了题为“十八世纪华南乡村社会和海外贸易”的发言。他指出，华南地区自宋元以来就有海上活动的传统，海外贸易一直没有停止。这种状况长期以来一直被官方资料所忽视。近年来大量的地方史料和海外文献表明，以环中国海为单位，存在着极其活跃的私人贸易。对于十八世纪的海禁政策应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吴建雍分析了清代中国与东印度公司的关系，认

为从国际白银流动的情况来看，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出现了一种互动关系，但由于统治者政策不利，闭关锁国，失去了被纳入正在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的有利条件。

（四）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张顺洪着重比较了中英世界观念的差异。他认为，当时英国已经形成了群族的世界观念，将中国纳入世界体系进行考察。而中国还没有形成世界性的观念，缺乏世界战略和世界眼光。英国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中国对英国的了解。徐蓝指出，欧洲早在十七世纪就在国家关系原则问题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三十年战争以后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是近代国家形成的基础，已经初步具有了国际法的概念。而同时期中国却没有主权国家的理念。而且欧洲十七、十八世纪已在历史编纂学上有了世界史，中国却没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黄爱平着重分析了当时学者对西学的看法和世界观念，认为当时学者普遍沿袭了明末以来的“西学中源说”，这种肤浅的认识与西方学者积极了解中国的欲望和做法截然不同。而且当时学者缺乏全球观念，仍然是中国古代“夷夏观”的繁衍，没有突破，这对中国融入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无疑起到了阻碍作用。徐浩从阶级结构方面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十五到十八世纪英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传统的贵族逐渐消亡，新兴的贵族将自己的利益与工商业联系起来，热衷于开矿山，办农场，改良技术等，而作官只是副产品，属于双轨制社会；而中国的科举制度把自己的利益和封建王朝结合起来，属于单轨社会。吴建雍和耿昇强调应该历史地分析当时在西方出现的“中国热”现象。当时西方虚构了许多中国的美好形象，实际上并不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主要是为了本国政治斗争的需要。刘明翰指出中西差异的四个方面：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与西方重商主义在指导思想上的不同；中国是封建思想的巩固和发展，西欧是民主思想得到了发展；中国是巩固君权，提倡人治，西欧提倡人权和法制；中国教育以儒学为主，西欧重视多学科发展。

（五）与会者对“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问题研究的继续深入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胡绳武认为，在肯定十八世纪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贡献的同时，对于中国为何没有顺利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历史根源分析略显不足。瞿林东则认为，中国落后的时间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仅仅从十八世纪甚至整个清代来看，都不能解决，建议研究明清史的学者应该进行合作。徐蓝指出，目前对“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问题的比较研究集中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比较，而对于中国和周边国家，中国和日本的比较研究做得还很不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彭坤元认为，在诸如非洲等不发达地区也有关于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史料。北京医科大学甄橙对比了十八世纪中西方医学的发展状况，指出当时中国的医学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学者们普遍认为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的研究领域还存在着许多空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李景屏建议补充科技卷，瞿林东则认为应该补充编年卷。